

徐海 著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研究

雲海出版社發行

中國新民主主義
革命史的研究

著 徐海

雲海出版社發行

中國新民主主義
革命史的研究

著者 徐海

北京東總布胡同草廠小門八號

發行者 雲海出版社

代表人 王一天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基本定價 四元五角

出版時期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徐海著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研究

馬叙倫書

自序

我素有歷史癖。凡屬中國古今的歷史，都喜歡閱讀，尤喜歡中國近代史。抗戰前在北京大學肄業，即開始從事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和著述。今教育部長馬夷初師對此會有所指示。抗戰軍興之後，北京失陷，我自京出走，間關南下，隨學校而輾轉湘滇，深入邊徼。離校之後，復經歷西南各省。這幾年隨國難而奔走東西南北，流離遷徙，席不暇暖；然對於近代史事，則多所研求。凡報章雜誌之報道，公私著作之紀述，莫不盡量搜集，以爲撰述的根據。

抗戰結束之後，我到廣州，在廣州各大學任教。凡所講授與研究，都脫離不了近代史。而搜集史料已富，即開始撰述。曾著成中國抗日大戰紀一書，在廣州出版。旋即從事於近三十年革命史的撰著，完成了二十萬言。去年春，革命高潮震天撼地，我爲著追求新中國的光明，在國民黨反動派特務恐怖氣氛之下，攜稿前往香港，間關北來。於去年夏初到達北京。

北京原是中國文化都市，自解放之後，更成爲革命中心；因此史料的積聚，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在此一年半的時間，我盡量從事研究和撰述，先後整理和撰著的文章，已達五十萬言以上了。

目前全國正在展開學習高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史，成爲人人必需學習的一種學問。但曠觀目前出版界，對於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的重大問題，求其能作比較有系統和深刻的敘述與分析的，尙沒有看到。因此學習的人，感覺到很大的困難。著者不敏，竊不自量，乃將所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研究先行出版，希望和當世同志讀者，共同研究和討論；個人藉此亦可得到學習的機會。但這不過我全部著作中的十分之一，是一極小的引子。今後幾個月內，擬即將全部陸續分類出版，或者可供學

習人士的一些參考。以一得之愚，貢獻當世。庶幾塵露之微末，藉補山海之高深。

此書主要部份，曾承 馬夷初師幾次的指示，並由他代轉請 范文瀾先生校正。最後復承馬夷初師之囑，根據范先生的意見，重新改正，成爲定稿。一年以來，馬夷初師以政務繁劇之身，時時抽暇指示。對於這種熱誠的愛護和指示，謹於此致其最深切的謝意。

范文瀾先生爲本書校正；鄭毅生師與白壽彝教授看過我的全稿，曾經賜予鼓勵和指示；蔡定詢君濬著爲我抄錄，甚爲勤勞；同學張蠡君，對我的研究和著述，先後都會有所幫助；均於此致其謝意。

此書如有些微價值，全出於諸師友與同志之賜；所有錯誤，則個人獨負其責。尙望當世賢達不吝賜教，指其疏陋，正其謬誤；則我將感到十分的欣幸。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徐海自序於北京宣武門外香爐營頭條嘉應會館。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研究

第一章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	一
第二章	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	一五
第三章	『八一』南昌起義	一九
第四章	一九二七年後國民黨軍閥的大混戰	二五
第五章	中共武裝鬥爭從城市轉向鄉村	三四
第六章	土地革命時期的開始	四〇
第七章	紅軍的英勇鬥爭	四六
第八章	從冒險主義的『立三路線』說到革命指南的毛澤東思想	五一
第九章	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	五九
第十章	從福建人民政府說到西安事變	六一
第十一章	毛澤東領導抗戰的偉大政策	七〇

第一章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

中國自『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長成與蘇聯革命的影響，變成了覺悟了的政治力量，產生了中國共產黨，於是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遂形成了中國革命的洪流。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宣告成立。從此中國工人運動，就熱烈的展開。在五四運動開始時，工人羣衆雖然還是以配角的地位參加，但很快的就變成了獨立奮鬥的生力軍。工會組織漸漸在各地出現，在一九二〇年，我們已可看見粵漢鐵路南段和臨海鐵路工人的罷工。一九二一年，上海、廣州、漢口、香港、各地以及南北各重要鐵路線的工人運動都漸漸活躍，所以到了一九二一年底就爆發了香港工人的大罷工。與工人運動發展的同時，社會主義思想也就在這時期開始在中國生根。社會主義的思潮通過少數的先進知識份子而傳播出去，社會主義思想，幫助人民羣衆認識中國社會與中國政治，於是帝國主義與紳商買辦的哄騙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容易叫中國人上當了。有了工人運動，有了社會主義思想，共產主義的組織也就有了產生的基礎。

一九二二年初，香港有六萬工人的罷工，堅持至八星期，終於取得了勝利，達到了提高工資和建立海員工會的目的。由此就推動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這一年間就有上海紗廠，漢陽鐵工廠，京漢鐵路，安源礦場的罷工，十一月唐山煤礦五萬工人發動罷工。這煤礦因有英國資本的關係，英國即以武力協同直系軍閥的軍警施行鎮壓，一九二三年初，平漢鐵路工人組織總工會，吳佩孚用武力制止集會，工人罷工抗議，吳佩孚得了帝國主義者的支援，而在漢口，長辛店，鄭州進行對工人的大屠殺，造成『二七』慘案。

『二七』失敗之後，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陳獨秀的右傾的取消主義。陳獨秀在『二七』失敗中所得的結論，是工人階級沒有力量，於是他的整個機會主義的理論，就在此時完全形成了。陳獨秀說：『半殖民地之中國社會狀況，已然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這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基礎。』又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所以他就斷定『中國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階級的政治鬥爭之重要與可能』。這樣，實際上，是取消中國共產黨。

陳獨秀對於工人運動的取消主義的傾向，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在共產黨的擴大會議上，才糾正過來。此後共產黨對於工人運動，才又蓬蓬勃勃的開展起來。（新華版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頁九一——九二）

中共於一九二三年六月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討論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政策。然而在太會中發生了兩種傾向，一則是右傾，一則是左傾，右傾的代表是陳獨秀，他認為中共的一切工作應該歸國民黨，這樣事實上，掩藏了中共的特殊旗幟，和國民黨合併起來了。左傾的代表則是張國燾，他『反對在勞動羣衆中發展國民黨的組織，主張工人應該在自己的政黨旗幟之下參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資產階級性的國民黨便不免有混亂無產階級思想的危險。』他是根本不了解無產階級應該怎樣在廣大的革命運動中的統一戰線上爭取革命的同盟者。前一種表現是尾巴主義，後一種的傾向則是關門主義。毛澤東在這兩種的傾向當中，作了堅決的鬥爭，使大會正式通過和國民黨合作的統一戰線的正確決議。（蘇南新華版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頁一〇九至一一〇及新華版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頁四一）

由於共產黨的加入國民黨，於是推動了國民黨走上革命的途徑，一九二四年一月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於廣州，中共的反帝和反封建的口號遂爲國民黨所接受，而成了它的基本綱領。

在一次的大會中，李大釗、譚平山、于樹德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林祖涵、瞿秋白、張國燾、當選爲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但是在國民黨內部的反動派，代表買辦豪紳的馮自由、謝英伯、馬素、鄧家彥等即首先起來反共，於一九二三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即行離開廣東。到了一全大會之後，張繼、謝持、鄧澤如對於容共復表反對，於一九二四年七月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上提出了對共產黨的彈劾案；但是，孫中山則極力主張和共產黨合作。孫中山先生對於這一般頑固分子說：『你們不願意和共產黨合作，可以離開，我一個人加入共產黨奮鬥好了。』孫中山態度如此堅決，使到他們簡直沒有辦法，於是就把這一批反動派鎮壓下來。（以上除孫中山所說的幾句話是根據一九四九年八月人民日報何香凝於民革大會的談話外，其餘根據日本外事協會編支那共產運動史頁五四——五五）但是，這不過是表面的穩定，不久，又復分化。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孫中山北上。旋即到達北京。

前此在一全大會時候，因反共而離開廣東的極右派馮自由等竟於一九二五年一月，組織了國民黨海內外同志衛黨同盟會，並向孫中山提出『共產黨員須由中央委員會及執行部門中撤出』的種種要求。他們一方面提出反共要求，一方面復參加段祺瑞所召開的善後會議，這充分表現出既對軍閥投降。不久馮自由、章炳麟、周振麟、馬君武、田桐、居正、茅祖權等極右派和右派唐紹儀、張繼、謝持等二十餘人，在孫中山病篤以前的二月八日組織了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以從事於積極的反共。在這種情勢之下，汪精衛等左派（其實汪是假左派）乃於三月十日以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決定開除馮自由等三百二十人的黨籍。後來這一批人於孫中山逝世之後，即集中於西山孫中山之靈前開會，號稱西山會議派。（見支那共產運動史頁五七）

由於右派的開除，於是左派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員便於孫中山逝世之後一起回到廣東。但是，這時，舊的右派雖去了，新的右派又復起來，而且較之前此的右派更爲陰險和毒辣。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間，一個反共的封建買辦法西斯團體——孫文主義學會正式在廣東成立，並擬作示威遊行，向共產黨挑戰。這個孫文主義學會在理論上是以戴季陶主義爲基礎，在實在的指導上，是以蔣介石的封建勢力爲中心的。（見東北版人民公敵蔣介石頁十五，唯物史觀中國史頁一五一）於是左右派在廣州又展開了一場鬥爭。

這時候，左派國民黨和共產黨堅決反對右派，將當時幾個右派領袖戴季陶、孫科等驅逐出廣東，並且準備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造成左派與共產黨聯合的中央，可是中共中央的主張，認爲當時革命形勢在全國各處都遭受到打擊，因此主張向右派讓步，以保持聯合戰線。於是出廣東驅逐出來的右派領袖孫科、葉楚傖、邵元沖等到了上海，中共中央即刻和他們談判（一九二五年十月），並訂立了極退讓的條件：（一）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數；（二）由中共中央命令廣東黨部延遲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等到這些右派領袖回到廣東之後，再行召開。於是這些被廣東驅逐出來的右派領袖在中共中央自行讓步的政策之下，又復回到廣東參加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了。（見春耕書店出版華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史頁三〇四）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開於廣州。代表二百餘人當中，左派國民黨和共產黨人是佔了大多數的。毛澤東當時是參加了這個會的，當時廣東有省港罷工工人及進步羣衆二十萬人，常常遊行開會，晚上唱國際歌，熱烈的支持革命的大會。大會開了二十多天，選出了中央委員，通過了宣言，開除了西山會議派的重要份子。（見蘇南新華版吳玉章同志革命故事頁二二）

這次大會選出來的中共的中央執行委員有譚平山、林祖涵、李大釗、于樹德、吳玉章、楊匏安、惲代英、彭澤民、朱季恂等，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有毛澤東、路友于、董用威、屈武、鄧穎超、陳其瑗等。

這時中央黨部的部長八人。

組織部長譚平山

宣傳部長毛澤東代

工人部長胡漢民

農民部長林祖涵

商民部長宋子文

青年部長甘乃光

婦女部長宋慶齡

海外部長彭澤民

這八個部長當中，中共和左派國民黨佔了絕大的多數。（見支那共產運動史頁五九至六〇）在這種情勢之下大資產階級爲着實行爭奪黨的領導權，乃積極採取種種的陰謀；但是，陳獨秀只講聯合，而不講鬥爭，結果使到革命遭受了很大的打擊。

這時候毛澤東發表了中國社會階級的分析。（新民主出版社毛澤東自傳頁三四）中共中央裏面，張國燾只知道工人，而不知道農民，陳獨秀則並工人而尚採取輕視的態度。毛澤東乃不禁大聲疾呼，指出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力量，廣大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則是革命的『真正朋友』，大資產階級始終是佔在帝國主義的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是要加以堅決的打擊的。至於中產階級，是可能爭取過來做革命的朋友的，但是他們是軟弱的，是動搖不定的，須要提防它，須要督促它。（見胡華新民主義革命史頁七〇至七一）這就明明白白的昭示大家，革命是要以工人階級爲領導，以工農聯盟爲基礎，在和資產階級聯合的場合之下，是須要作堅決的鬥爭。惟有這樣，才能掩護革命；惟有這樣，

才能推動革命。但是，陳獨秀不能這樣做，於是遂爆發了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大資產階級的第一次大叛變。

蔣介石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看見了中共和左派國民黨緊密的聯成一氣，在中央黨部裏面有着重要的領導權力。於是他就不得不陰謀叛變了。他首先不經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通過，將國民黨左派的第二師師長龍冕，隨即召集孫文主義學會及黃埔少壯軍人的聯席會議，陰謀不軌。蔣介石由於黃埔學生軍的兩次東征，實力大增，地位驟高，即積極從事於爭奪領導權力。可是，共產黨和左派國民黨於此竟不能有所警戒。正在這時，蔣介石的一位競爭者，李濟深的軍隊爲着討伐廣東南路軍閻鄧本殷，而離開廣州之後，更格外增強了蔣介石的權力。於是遂有三月二十日的事變。（見唯物史觀中國史頁一五二）

三月十八日，酉刻，蔣介石和當時的海軍局長歐陽格密謀，以電話傳給中山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叫中山艦開赴黃埔，鎮壓暴動，李氏即遵命駛向黃埔，到達黃埔軍校，向教育長鄧演達聲稱：係奉校長命令調該艦特殊守候等語。因蔣介石那時尙留在省城，李之龍即將軍艦停泊在軍校門前達一晝夜，終不能見到蔣介石，更得不到任何消息，李之龍沒有辦法，只得於十九日深夜開回省城。蔣介石於是即藉口「該艦露械升火，經一晝夜」，顯係「共產黨陰謀暴動」，當夜廣州即告戒嚴。二十日晨蔣介石對共產黨員指揮的第四聯隊發下徒手集合，聽候處置的命令，結果第四聯隊陷入他的圈套之中。那指揮官隨即被捕了。蔣介石於是調動武裝，包圍了那廣東局面的偉大支柱的省港罷工委員會，包圍了東山蘇俄顧問住宅，扣押黃埔軍校中及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以周恩來爲首的全體共產黨員。

事後，國民黨要員開會商討，可是大家懼於蔣介石的權勢，默默無言，惟汪精衛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力言軍事領袖有所行動，必須事先獲得政治領袖的同意，蔣介石則謂「事態嚴重」，非採取

『斷然的手段』不可，否則，『恐國民政府及國民革命各軍以至廣東地盤，均非國民黨所有了。』衆人見將態度如此堅決，遂不敢有所異議，但汪精衛却因此而氣憤出國了。

在黃埔軍校與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共產黨員被扣時，蔣介石強迫共產黨退出第一軍，原來第一軍的建立和發展，是和共產黨人的汗血分不開的。東征時，蔣介石一度危急，共產黨陳賡還救過蔣介石一條性命。現在統一廣東之後，謀殺革命的蔣介石就採取了這樣的手段來報答。但蔣介石的說法是這樣：『今共產分子，爲免除本軍內部之糾紛，均願以一律自動的退出，並期於他種工作上，共同奮鬥。』以這個軍事上的『殘忍陰謀』爲主要契機，蔣介石即開始宣傳他那一個主義一個黨的獨裁政治了。（見華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國大革命史頁八八，唯物史觀中國史頁一五二，人民公敵蔣介石頁十六至十七，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頁六八至六九，李創農中國近三十年政治史。）

在這事變的緊急關頭，毛澤東曾主張對於蔣介石這種叛變，應該給予堅決的打擊，但右傾機會主義的陳獨秀，竟不能夠採取，只講片面團結，不講正面鬥爭，於是反革命的氣焰遂乃日益高漲，不久遂有更進一步的『黨務整理案』出現，革命愈陷於不利的境地。（見人民公敵蔣介石頁十八）

五月十五日，蔣介石召集了一個國民黨二中全會，要國民黨中央推一主席，結果就推了他自己。於是他就把國民黨的政權和黨權都拿到他一人手裏去了。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黨務整理案』：

1. 共產黨在國民黨各高級黨部不能佔委員三分之一以上；
2. 共產黨不能當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长；
3. 國民黨黨員不得加入共產黨；
4. 共產黨須將加入國民黨的黨員名單交國民黨中央保存；
5. 第三國際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指示，需先交國共聯席會議通過等。（見吳玉章同志革命故事頁二）

二、蘇南新華版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頁一三六

這對於中共，自然給予極嚴厲的限制。當時的右傾機會主義處處退讓，表現出無原則的遷就，於是大資產階級肆無忌憚，進一步，發動更大規模的『四一二』叛變了。但當時，由於共產黨人及左翼革命勢力以及廣大羣衆力量的推動，廣東國民政府的政權，在內外夾攻中終於趨於鞏固，因此得於順利進行北伐的工作。

蔣介石利用了三月二十日事件以後所竊取的政權黨權，而竊了北伐軍總司令的名義。蔣介石企圖在這個『總司令』的名義下，形成一套完整的軍事獨裁。但是北伐並不是蔣介石的功勞，蔣介石不過因人成事。北伐之所以能够得到重大的成就，乃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所領導的革命的工農羣衆的力量。在廣東由中共所組織的農民協會，擁有數達八十萬人以上的農民，農民協會的分會，普遍到六十個縣分中，特別是海陸豐的農民協會更是蓬蓬勃勃，盛極一時。國民革命軍的兩次東征，便獲得絕大的幫助。

中共黨員雖然被逐於第一軍，但在其他的軍隊中，他們還是堅守着一系列的位置。不但如此，中共黨員還能利用國民革命軍各指揮官之間的各種矛盾，強化民衆運動，因此廣東雖在三月二十日以後，也依然是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堡壘。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及一部份非買辦的民族資產階級的集團的進步勢力，仍然保持着相當堅固的基礎。這在北伐當中，就明明白白的表現出來。

北伐軍向湖南進展，受到工農羣衆的熱烈支援，共產黨員和左派國民黨將大衆組成勞工聯合會及農民協會。吳佩孚的後方，不斷的發生農民暴動，因此吳軍在內外夾擊之下，終於土崩瓦解了。

由於北伐的着着進展，工人掀起了熱烈的罷工會潮，他們要求提高工資，實施八小時的勞動制，

擬定勞動法規。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旬，經過漢口的日人各企業機關總罷工之後，各勞工聯合會使各方面的勞動者，一舉提高了工資百分之二五——七五。於是外人各企業終於不得不承認勞工聯合會。廣泛的經濟的罷工波濤，席捲了整個上海，他們將工資提高到百分之二〇——二五，有組織的勞動者的數量，也急劇地增大了。

吳佩孚統治下的湖北省，勞工聯合會的人數雖僅有三千至四千人，可是革命軍佔領了武漢幾個月以後，勞工聯合會的人數既經達到四十萬人了。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湖北省的勞工聯合大會依據生產的原則，改組了勞工聯合會。在會議中，議決加入國際勞工協會。勞工運動的指導，緊握在共產黨員的手中。農民的組織，也開始同樣迅速地成長起來。由農民協會所組織起來的農民的數量，到一九二七年五月為止，大約在湖南省是五百萬，在廣東省是一百二十萬，在湖北省是一百七十萬，在河南省是一百萬。

一九二七年春季的農民運動中，依然是對於減低佃租及賦稅，消滅豪紳對農民的特權，解散地主的民團，組織農民自衛隊等等的要求，佔着主要的地位。然而在湖南省既經開始了爲獲得土地的鬥爭。農民協會無論在鄉村中，或城市上，都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指導。（見唯物史觀中國史頁一五三至一五六）

向湖南進發的北伐軍是第四第七和第八軍，而以第四軍爲主力，第四軍中葉挺爲獨立團團長，軍隊中共產黨員極積極，軍隊訓練有素，政治工作良好，配合羣衆的發動，所向無敵，號稱鐵軍。

九月間既攻下漢口漢陽，十月十日下午武昌，蔣介石所率領的一路向南昌進攻，裝備雖好進展却很慢，南昌遲遲才打下。

北伐軍節節勝利，開展了空前未有的局面，但軍事大權集中在蔣介石的一人手中，於是廣東方面

國民黨中央乃於一九二六年八月底召開執監委聯席會議，通過了一些重要議案。恢復國民黨內民主制度，反對個人獨裁，保護工農運動，規定二五減租等等。

革命軍到達了武漢之後，武漢羣衆運動蓬勃展開。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英水兵擊傷中國人力車夫，數十萬羣衆舉行示威，政府依靠羣衆力量，強硬交涉，收回漢口英租界，震動了全世界，於是武漢成了革命的中心。

蔣介石在江西主張國民政府遷往南昌，以便易於控制，但是大家堅決的反對。當時廣東國民黨中央決議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遷移武漢。在十一月初，國民黨中委與國民政府委員，既有一部份到武漢。到了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全部到達辦公。

自漢口租界收回後，世界輿論都承認武漢政府是革命的中心。外國報紙上那時也說這是八十年來中國不會有過的勝利外交。於是蔣介石遷都南昌的想法更不可能實現了，他也只有到武漢看一看情形。他到武漢時，民衆數十萬人開會歡迎。他講話時，會中就有人問他：爲什麼不搬到武漢來？什麼時候搬來？他沒有法答覆。他在這裏感覺到武漢革命羣衆的力量可畏，回到南昌後，就更不願來了。

這時南昌與武漢之爭很僵持，蔣介石在南昌召集一秘密軍事會議，企圖以武力威脅武漢政府，武漢政府乃召集一個黨政軍擴大會議，通過提高黨權，實行民主，反對獨裁，決議於三月七日召集國民黨三中全會解決一切問題，同時推舉五人成立一行動委員會，以吳玉章、鄧演達、徐謙、孫科、顧孟餘、當選爲委員，以便執行這一決議。

三月七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開會，蔣介石拒絕不出席。但是這次會議還是勝利的完成了：廢除國民黨主席制爲九個常務委員的會議制，以軍事委員會代替總攬軍政的總司令制，同時決定改組國民政府。